本版编辑：史小今
E-mail：m2@studytimes.cn
Tel：010—62804757

热点透析

美国打击伊斯兰国缘何鲜有收效

作为叙利亚内战爆发后迅速壮大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受到包括地区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普遍抵制和打击，美国甚至组建军事联盟试图消灭伊斯兰国。然而截至目前，所有对于伊斯兰国的打击行动都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无论从其继续恐怖行动的程度，还是占领地区的范围，伊斯兰国都未见有丝毫“退缩”的迹象。双方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 李子昕

作为一个奉行宗教极端主义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对中东乃至全世界造成的严重威胁是令人惊愕的。相比基地组织，它的残忍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相比曾经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它对控制区域实行着更加深刻的“有效统治”。作为叙利亚内战爆发后迅速壮大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受到包括地区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普遍抵制和打击，美国甚至组建军事联盟试图消灭伊斯兰国。然而截至目前，所有对于伊斯兰国的打击行动都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无论从其继续恐怖行动的程度，还是占领地区的范围，伊斯兰国都未见有丝毫“退缩”的迹象。双方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美国领导着拥有无数先进武器和丰富地区作战经验的“抗伊斯兰国联军”，却始终无法消灭这样一个地区恐怖组织，令人疑惑的表象之下实则掩藏着深刻的内在原因。

地区动荡成恐怖主义温床

中东地区长久以来受到内部教派冲突、宗教极端主义和外部霸权主义的影响，冲突纷争不断。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间的对抗，在地区冲突中亦被不断放大。常年的战乱给地区民众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经济的停滞和社会的动荡让百姓无事可做、无家可归。民众对生存境遇的不满和对外部压制的愤怒被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所利用。2010年底开始的西亚北非政局动荡非但没能带来“阿拉伯之春”，反而以地区国家经济衰退、社会矛盾加剧而告终，叙利亚更是陷入无休止的内战之中。“伊斯兰国”最初利用民生问题，大肆鼓吹“拯救和改造”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在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中发展支持者。

此外，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强推的中东政策助长了极端思想在中东的蔓延。无论是美国小布什政府在伊拉克战争后推出的“大中东民主计划”，抑或是奥巴马政府在“阿拉伯之春”发生伊始飘忽不定的摇摆政策，均使得中东国家从民众到政府对外部势力以霸权角色强行介入中东内部事务的做法极为不满。西方的政策从政治上无法使地区局势趋向稳定，经济上更不能给民众的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善，年轻人对于自身前途和国家发展看不到更好的未来；而极端组织却在此时为他们提供了“另一条出路”。中东地区整体的政治动荡、经济衰退和暴力冲突，为滋生恐怖主义创造了社会基础和可能，也是伊斯兰国得以存续的根本原因。

打击伊斯兰国或帮助反美势力

作为逊尼派极端主义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主要作战对象是本地区的什叶派力量——叙利亚阿萨德政府、伊拉克现政权、伊朗、黎巴嫩真主党等。除伊拉克现政权外，其他伊斯兰国的主要打击对象亦是美国的宿敌。这便构成了政治上的尴尬境地：敌人的敌人并非朋友。美国反对叙政府的立场依然未变，双方虽然同时在打击“伊斯兰国”，但相互间没有合作；西方支持的“温和反对派”在战场上同叙政府军作战，对伊斯兰国却难以实施有效打击，且无法为盟军对伊斯兰国的空袭行动提供地面军事支持。什叶派最主要的地区强国伊朗，尽管已经与美国就核武问题达成协议，两国关系亦在逐步改善，但尚且达不到在战场上同仇敌忾的水平。因此，美国对伊斯兰国的打击常畏首畏尾，犹豫不定。

事实上，美国的中东政策向来倚靠本地区逊尼派海湾君主国的强力支持，而对于什叶派，美国同其中东盟友的态度基本保持原则一致。叙利亚内战发生后，作为打破“德黑兰—大马士革”什叶派新月带的核心一环，包括美国和地区逊尼派大国在内的众多地区和国际力量，对于叙利亚武装反对派中的极端势力较为纵容。伊斯兰国的前身，便是利用叙反对派接纳任何愿与巴沙尔政权为敌的力量的心态，在叙境内招兵买马，借机壮大；然而待其露出极端主义倾向、引起世人警觉之时，已然形成气候而难以消灭。

内存缺憾的抗IS国际联盟

“9·11”后，美国接连发动两场中东地区战争，无论从财政支撑还是民意舆论，都已经成为美国现任政府难以承受之重。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便致力于从中东抽身，并进而依托再平衡战略将目光转向亚太地区。伊斯兰国的不断壮大，使美国不得不动用资源着手解决这一难题；但由于与自身战略布局相悖，美国又不愿花费过多精力加以应对。因此，对于伊斯兰国的打击，难免“雷声大雨点小”，言语谴责大过实际行动。

美国多次表示，不会再派遣大规模地面部队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取而代之的是领导空袭，并依托其中东盟友打击地区恐怖主义势力。2014年10月，美国组建21个国家共同参与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然而其行动效果难言乐观，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境内攻城略地的势头并未因空袭而减弱。从军事角度而言，由于美国与叙利亚政府军空中与地面力量没有联动，伊拉克政府又没有能力提供相应的地面行动配合，联军对伊斯兰国的空袭行动无法与地面攻势相辅相成形成合力。加之伊斯兰国已然控制大片叙利亚和伊拉克城市区域，一旦极端分子混进人口稠密区，大面积空袭难以展开，因而联军的空袭只能以该组织的物流设施、军事基地等固定目标为主，消灭伊斯兰国有生作战力量并非易事。美国寄希望于提高其地区盟友的作战能力来打击伊斯兰国，但受限于多种因素，这一方案更是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资料图片：澳大利亚准备派遣士兵，协助美军打击“伊斯兰国”。

此外，美国组建的国际联盟亦非铁板一块。“伊斯兰国”虽是共同的敌人，但对具体参与国而言，却不一定是威胁最大、最急需对付的敌人。对“伊斯兰国”要打击到什么程度，实现什么目标，反恐同盟内部分歧明显。在海湾君主国看来，其面临的地区什叶派势力上升风险远超过伊斯兰国带来的现实威胁，特别是伊朗核协议达成后，伊朗在地区无论是军事、政治还是经济的影响力都会显著增强。伊斯兰国的存在将在很大程度上占用伊朗的精力和资源，客观上为海湾君主国应对地缘政治时局变化争取了更多的时间和可能。在土耳其看来，伊斯兰国固然是严重的地区安全威胁，然而困扰其多年的切肤之痛是居于伊朗、伊拉克、土耳其边界的库尔德民族。何时打击伊斯兰国、如何打击，在土耳其的战略部署中都掺杂入有关解决库尔德问题的考量。

目前，美国国内民众反战声音高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愿被卷入新的战争。在即将进入选举季的美国社会，舆论的力量将很大程度上影响民主、共和两党在明年大选中的选情，奥巴马政府势必谨慎应对。除公众舆论，美国学界对于应对伊斯兰国的方法也有不同的考量。有学者提出，美国没有终结逊尼派和什叶派争斗的义务，也缺乏实现政治解决方案的手段，难以在中东实现其主张的西式民主；“离岸制衡”或许是美国解决地区难题的唯一出路。然而，这一建议只能将伊斯兰国的安全威胁暂时降低或推延，并不能根治这一恐怖主义顽疾。在众多议论和声音中，奥巴马政府亦是举棋难下。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势必加强对于伊斯兰国的打击力度，并更高程度地开展与地区盟友的军事合作；然而距离彻底消灭伊斯兰国的目标，依旧任重而道远。

国际政治

联合国改革向何处去

□ 秦治来

21世纪该有一个什么样的联合国？这是一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最为关注却又最为纠结的话题，围绕联合国功过是非、利弊长短的讨论不绝于耳。《联合国宪章》签署至今，联合国已经走过70年风雨伴辉煌的历程。70年是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人们在追寻“在变革中成长”的联合国记忆之时，也不免憧憬“在期许中转身”的联合国未来。在纪念联合国成立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再次聚焦联合国改革，无疑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世界格局变化呼吁联合国改革

联合国不是空中楼阁，它必须适应和反映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的变化。当今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加速调整演变。与此同时，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依然任重而道远。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要求联合国承担更多的责任，而联合国仍然基本保持成立之时的运行机制。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产物。经过几十年的运转，联合国内部效率低下、行政成本高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联合国自身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正如潘基文在纪念《联合国宪章》签署70周年活动上发表的演说所言：“联合国成立七十周年正值人类大家庭处于一个重大的转型期。这个在创立之初由51个国家组成的组织现在已经有193个会员国。1945年估计为23亿的全球人口现在已是一个由70亿人组成的单一人类大家庭。”发展中国家的成员比重增加，深刻地改变了联合国的命运和面貌。为了加强对国际事务的主导，联合国自我推进改革势在必行。



联合国总部公众入口广场“打结的手枪”雕塑。表示了人们对非暴力的向往，以及呼吁国际裁军行动。

世界各国对联合国充分发挥功能寄予厚望。1993年联合国大会决定成立改革专门小组以来，联合国的改革每年都会成为大会议题。有些国家实力增长迅速，认为有能力、有资格为国际和平承担更多的责任，对推进联合国改革的愿望愈发强烈。有的新兴大国重视通过争取入常来展示强大的国际影响力；有的发展中国家希望在联合国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和代表性；有的中小国家通过参与联合国改革来证明其对外行为能力。凡此种种，参与联合国改革，已成多数国家不言自明的对外工作惯例。

联合国改革只能稳中求进

联合国是目前国际上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这种无可替代的国际地位和作用意味着，联合国的改革必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联合国需要改革已成共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推进。目前，主要有两种思路：激进主义和渐进主义。前者试图彻底改革联合国运行机制，重新设计组织机构，并提出一揽子改革计划。后者主张在联合国现有框架内，遵循《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原则稳步改革。理性地看，联合国的地位和权威屡遭挑战，不应该也不会成为重组联合国的理由。70年来，联合国为维护国际和平安全、推动共同发展和促进人权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有目共睹，自身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完善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有目共睹。在原有机制仍能发挥建设性作用的情况下，“破旧立新”的改革方案显然不合时宜。

即便联合国改革采取渐进主义的稳妥路线，具体实施过程仍存分歧。在改革目标上，发达国家希望推广其奉行的价值观，要求赋予联合国干预国内政治的权力，扩大安理会行动权力。发展中国家希望增加发言权和代表权，扭转“重安全轻发展”的局面，倾向于经济社会发展。鉴于此，联合国的改革应有利于推动多边主义，提高联合国的权威和效率；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最大限度满足所有会员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增进会员国团结。特别是，坚决反对人为设定改革期限，反对就尚未达成共识的议案进行强行表决。简言之，联合国客观上需要改革，但是彻底的、大规模的改革条件远未成熟。

安理会改革是重中之重

安理会的改革历来备受关注，是联合国改革的重中之重。安理会承担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是联合国系统中唯一有权采取行动的机构，属于联合国最核心、最权威的部门。安理会的改革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增加代表的问题，二是常任理事国否决权的问题。关于扩容，多数国家希望增加安理会的席位，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尤其要增加一些非洲代表；巴西、印度、德国、日本则积极谋求入常，“四国联盟”在2005年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入常风波。关于否决权，争论焦点有二：既有否决机制是否保留，废除一方认为否决权意味着大国政治对联合国的操控；新成员是否享有否决权，反对一方认为否决权的增加可能会使安理会的协议更难达成一致。历史地看，尽管否决权在使用过程中存在诸多争议，但是它对维护国际社会安全、防止战争悲剧所起到的“安全阀”式作用显而易见。因此，推进安理会改革，要坚持均衡性原则和协商一致的精神；不设时间表，不要人为规定动作；增加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国家参与决策。特别是，改革安理会，应充分考虑联合国系统内外的配套改革。要知道，安理会不是凌驾于联合国之上独立机构，而是联合国系统的一个机构。

总之，联合国改革无论走得多么远，也始终不偏离《联合国宪章》精神光耀下的“方向盘”。联合国的改革不可能是个别国家“自编、自导、自演”的舞台剧，只能是各国共享多边主义魅力的一幕大戏。

时　评

善战者不言战 战则必胜

——战后中日关系

□ 卜振兴

从东汉时期到现在中日交往已有两千年历史，其间，中日关系几经起伏，充满波折。如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有70年，中日关系却正经历着自战后以来的寒冰期。这一紧张局面始于2012年日方不顾中方强烈的反对“购买”钓鱼岛，实行所谓的钓鱼岛“国有化”。这一单方面行动，完全背离了中日关系宗旨，极大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严重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晋三上台后，更是不顾包括中国、韩国等国家的强烈反对，参拜供奉有日本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篡改历史教科书、否认和粉饰侵略历史，使得本已日趋紧张的中日关系火上浇油。

目前，中日双方在以下方面存在矛盾和分歧：一是领土边界问题，包括钓鱼岛及附属岛屿的归属问题，春晓油气田的开采区和所有权争议，以及防空识别区等问题；二是历史问题，包括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篡改历史教科书、处理慰安妇及其他历史遗留问题；三是意识形态问题，这是两类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共有的问题，中日之间也不例外；四是安全困境问题，日本处于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国，自然和经济资源有限，日本的发展面临着很大的瓶颈，而日本的本土东面向海，西面和背面都是强大的近邻。日本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安全困境问题显得更加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日本急于打破第一岛链、第二岛链，修改和平宪法的原因。

面对一个善变的日本政府和日趋紧张的中日关系，我们应该采取下列措施。

发展自身实力才是硬道理。外交是一个国家政治的延伸，也是一个国家实力的体现。对外交往的基础是自身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邓小平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自身的发展”，这句话运用到中日关系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如果说“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那么经历过近代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日本侵华战争洗礼的中国人民对这句话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因此，处理国际关系的基点在国际交往，更在于自身实力。

国际关系要服务于国家利益。德国著名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曾经有一段关于国际关系的经典论断“没有永恒的盟友，也没有永恒的仇敌，只有永恒的利益”。邓小平也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指导处理国家关系。1989年10月他在同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谈话中指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这反映了我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思想的根本性变化。在处理中日关系上，我们必须坚持外交服务于国家利益这个最高原则。我们期待中日关系的改善，并愿意采取切实行动去改善中日关系，但是这都要在不损害我们的国家利益为前提下进行。

国际关系绝不是非黑即白。在国际关系中有一种“一刀切”的观点，认为一旦两国关系恶化，双方就没有接触和交流的必要，这种观点在冷战时期较为流行和普遍。但是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早已经脱离了简单地“非黑即白”“非敌即友”的关系，而是更加多元和更加复杂，这是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的一个新特点。如斯诺登危机后的美俄关系、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的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等等。即使在中日关系剑拔弩张的今天，中日之间的交往也没有中断。那种“老死不相往来”的做法在国际关系中基本是行不通的，也不符合我国的国家战略利益。因此，对于中日关系而言，我们一方面要警惕日本右翼势力的不断抬头，另一方面还要同日本保持必要的接触和交流，以更加灵活的国际关系政策应对复杂的中日关系。

善战者不言战，战则必胜。“兵者，国之大器”。我国历来奉行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如果不是触动核心利益，不会轻言战争，这是基本原则，也是爱好和平的人类共同的期望。但是，不言战并不代表着不备战。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绝不仅仅取决于一方，即使我们抱有和平信念，如果对方一意孤行，反其道而行之，那么战争的危险也是现实的。未雨绸缪，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一切不利情况，我们应该从实战角度出发，加强军队和国防建设，不战则已，战则必胜。

70年前中国人民取得了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70年后的今天，中日关系再度紧张。如何应对中日关系的各种变化，我们必须采取主动措施。对于我们而言，必须坚持以发展自身实力为基础，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全面完整地看待中日关系，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不轻言战争，但是战则必胜，这才是有效应对中日关系和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选择。